

被弟子超越之後 ——胡適的馮友蘭情結

翟志成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引言

胡適當了一輩子的「青年導師」、「學界祭酒」和社會的「意見領袖」，偶然也會勸勉大家「努力做學閥」¹。他喜歡熱鬧、喜歡交際應酬、喜歡提攜後進扶危救急，但也會拉幫結派爭名爭位，有時也會月旦人物引來是非。是以他一生之中，有過眾多的學生和朋友，但也結下了一些冤家或對頭。在所有的冤家或對頭中，馮友蘭如果不算是胡適最憎惡的人的話，起碼也是最憎惡的人之一。

胡適的主要敵人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政治上的敵人，一類是學術文化上的敵人。一般而言，胡適對政治上的敵人要比學術文化上的敵人更為寬容一些。但無論是對政敵和學敵，胡適大都放不下「正人君子」的身分和「縉紳階級」

拙文蒙陳永發院士、賀照田教授，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閱讀原稿並賜予寶貴意見，文哲所王福禎先生細校全稿並改正筆誤與引文上的訛漏，肅此鄭重申謝。蔡仲德教授與馮鍾璞教授多年來對筆者的不吝指教與鼎力支持，尤其令人感銘不已。蔡先生在今年二月遽歸道山，已不及親睹拙文之正式出版，哀傷之餘，不禁有碎琴焚稿之想。謹以拙文作為生薑一束，呈獻給蔡先生在天之靈。

¹ 這是胡適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一日北大正式開學之日，在學生們如雷般的鼓掌聲中，在講臺上為「報答」學生們的「好意」所講的「老實話」。其原話是：「人家罵我們是學閥，其實『學閥』有何妨？人家稱我們為『最高學府』，我們便得意；稱『學閥』，我們便不高興。這真是『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了！我們應該努力做學閥！」引自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一日胡適的日記，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冊，頁496。

(gentleman) 的架子²，而總會顯示出其寬厚、持平、講理、公道、彬彬有禮和不為已甚的良好態度和修養。例如，魯迅是胡適的政治敵人，對於魯迅經常在文章中或明或暗的攻訐譏刺，胡適幾乎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而對於魯迅在文學創作上的天才，胡適一生都秉持著「最誠意的敬愛」³，對於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胡適無論是在公開或在私下也一再表示欽佩⁴，並為陳源、蘇雪林誣指該書抄襲自日人鹽谷溫一事大聲替魯迅叫屈⁵。又如，胡適對梁漱溟的文化觀幾乎完全不能同意，兩人也常為中西文化問題有口頭上或文字上的爭論，有時雙方都不免動了火氣而互指對方「刻薄」⁶。但在胡適的內心深處，對梁漱溟的操守、人格及其以聖賢自任的氣魄和擔當其實是十分的敬服⁷，有時甚至還會興起自愧不如之嘆⁸。又例如郭沫若兼胡適的政敵與學敵於一身，而胡適也頗為鄙薄其「阿諛」和「無行」⁹，但由於郭氏在甲骨文研究的成就，胡適也照樣提名他為第一屆中央研

² 參見胡適：〈胡適致蘇雪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1983年），中冊，頁339。

³ 胡適在致周作人函云：「生平對於君家昆弟，只有最誠意的敬愛，種種疏隔和人事變遷，此意始終不減分毫。……」（胡適：〈胡適致周作人〉，同前註，上冊，頁544）。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一日胡適在日記中亦云：「周氏弟兄最可愛，他們的天才都很高。豫才（案：魯迅，本名周樹人，字豫才）兼有賞鑒力與創造力……」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3冊，頁755。

⁴ 胡適在其《白話文學史·自序》云：「在小說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頗有一點點貢獻，但最大的成績自然是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這是一部開山的創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斷制也甚謹嚴，可以替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節省無數精力。」引自胡適：《白話文學史》（上卷）（臺北：胡適紀念館，1974年），頁9。

⁵ 胡適致蘇雪林函云：「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案：陳源字通伯）先生當日誤信一個小人張鳳舉之言，說魯迅之小說史是抄襲鹽谷溫的，……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寫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 [紳士] 的臭架子』，值得擺的。如此立論，然後能使敵黨俯首心服。」引自胡適：〈胡適致蘇雪林〉，頁339。

⁶ 詳見胡適：〈答梁漱溟〉，收入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上冊，頁311-312。

⁷ 例如，胡適在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七月在報上讀到〈梁漱溟不肯洗腦〉的報導，十分感嘆，忍不住在日記中寫道：「漱溟今天的行為也是『殉道者』(martyr) 的精神，使我很佩服。『不能向不通處變』，不能『自昧其所知以從他人』，都是很可敬的。」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8冊，頁219。

⁸ 胡適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的日記中，曾剖判自己與陳獨秀和梁漱溟的差異，認為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獨秀那樣狠幹，一方面又沒有漱溟那樣蠻幹！所以我是很慚愧的。」見同前註，第4冊，頁138。

⁹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日胡適的日記，同前註，第8冊，頁4-5。

研究院的院士¹⁰。

胡適曾說過：「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¹¹此話說得何等的好！如果說，胡適對魯迅、梁漱溟、郭沫若等政敵學敵，確實秉持了「惡而知其美」的持平態度，但當他一面對馮友蘭，便好像變成了另一個人，不僅「惡而知其美」的持平態度不翼而飛，就連他平日頗為自矜的「正人君子」的身分，還有那「縉紳階級」的架子，也可以因馮友蘭而拋入汪洋大海。對馮友蘭的憎惡，已在胡適心中糾結成一團漆黑的壘塊，幾乎是終生不可開解。胡適長時期對馮友蘭的種種苛責，與他一貫待人接物的溫良恭儉讓，構成了如許巨大的反差。這不僅使胡適的研究者咸感困惑，恐怕就連胡適自己一時間亦難以說清楚講明白。

一、由親近到疏離

其實，胡適對馮友蘭的心結，是大約在一九二九年底讀到馮友蘭寄來的《中國哲學史》部分書稿時始種下的。在此之前，胡適不但不憎惡馮友蘭，而且有一段時間和馮友蘭的關係還頗為親近。一九一七年九月，當胡適由美學成歸國並第一次在北大開講「中國哲學史」課程之時，馮友蘭正好在該校的「中國哲學門」攻讀，並剛剛升上三年級¹²。若以年齡而論，胡適在當時還不滿二十七足歲，僅比馮友蘭大四歲，比「中國哲學門」二年級生顧頤剛大不到二歲，比「國學門」二年級生傅斯年大四歲多一點¹³。若以國學修為而論，胡適不僅無法和劉師培、黃侃、陳黻宸、陳漢章等在北大任教的經史學大師比肩，即令與馮友蘭、傅斯年、顧頤剛等國文程度超強的大學生相較，亦容或有所不及。但是，這幾個心高

¹⁰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胡適的日記，同前註，第7冊，頁656-657。

¹¹ 胡適：〈胡適致蘇雪林〉，頁339。

¹²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收入《三松堂全集》（第一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187。

¹³ 胡適出生於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白吉庵：〈胡適年表〉，《胡適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497），馮友蘭出生於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四日（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3），顧頤剛出生於一八九三年五月八日（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頤剛》〔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傅斯年出生於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見岳玉璽、李泉、馬亮寬：《傅斯年：大氣磅礴的一代學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

氣傲，目空一切，動不動就要帶頭鬧事驅逐「不夠格」的老師的危險分子¹⁴，卻在聽過胡適的「中國哲學史」之後，對這個年紀與自己相差不遠，國學程度也不見得比自己高明的新來老師，一齊佩服得五體投地。顧頤剛對自己和傅斯年從懷疑胡適到信服胡適的轉變，有極生動鮮活的回憶：

哲學系中講《中國哲學史》一課的，第一年是陳伯弢先生（漢章）。他是一個極博洽的學者，供給我們無數材料，使得我們的眼光日益開拓，知道研究一種學問應該參考的書是多至不可計的。他從伏羲講起；講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範〉。……第二年，改請胡適之先生來教。「他是一個美國新回來的留學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學裏來講中國的東西？」許多同學都這樣懷疑，我也未能免俗。他來了，他不管以前的課業，重編講義，（辟）〔劈〕頭一章是「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徑）〔逕〕從周宣王以後講起。這一改把我們一班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撻而不能下。許多同學都不以為然；只因班中沒有激烈分子，還沒有鬧風潮。我聽了幾堂，聽出一個道理來了，對同學說：「他雖沒有伯弢先生讀書多，但在裁斷上是足以自立的。」那時傅孟真先生（斯年）正和我同住在一間屋內，他是最敢放言高論的……我對他說：「胡先生講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膽量，有斷制，確是一個有能力的歷史家。他的議論處處合於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說而不知道怎樣說才好的……」他去旁聽了，也是滿意。從此以後，我們對於適之先生非常信服。¹⁵

馮友蘭一貫強調：向西方學習，所要學的並不是西方的「跡」，而是其「所以跡」；即如向神仙學點金術，所要的並不是神仙由石頭變出來的黃金，而是神仙那根能把石頭變成黃金的手指頭¹⁶。那根手指頭就是現代學術的方法學。馮友蘭、顧頤剛、傅斯年在胡適講授中，真正體驗了西方方法學的驚人威力，也領悟到現代學者（如胡適）之所以比傳統學者（如陳黻宸、黃侃、陳漢章）站得高，

¹⁴ 當時北大學生氣焰熏天，動不動就驅逐他們認為不稱職的教師。馮友蘭和傅斯年就曾分別在哲學門和國學門當過驅逐老師的帶頭人。馮友蘭曾帶頭驅逐哲學門教師之事，見馮友蘭：《三松堂自序》，頁296-297；傅斯年曾帶頭驅逐國學門教師之事，見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收入《羅家倫先生文存》（臺北：國史館，1989年），第10冊，頁74-75。

¹⁵ 引自顧頤剛：《我與古史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頁40-41。

¹⁶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頁202-203。

看得遠，全在其掌握和運用了西方的理論和方法。在驚駭得「舌撻而不能下」之後，他們便都一齊低首降心，決心以胡適為師，把西方的點石成金術學到手。

而馮友蘭則一直到了垂暮之年，仍充滿了感恩地談到了胡適的哲學史課程是如何地引起他對西方的現代學術方法學的驚羨¹⁷。即使過了六十多年，馮友蘭還是照樣興致勃勃地談及胡適的「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和「系統的研究」在方法學上的突破和創新。所謂「證明的方法」和「扼要的手段」，就是把三皇五帝等許許多多的無稽之談一刀砍掉，一部中國哲學史直接從老子、孔子講起。這麼一來便把馮氏從「毫無邊際的經典注疏的大海」中拉拔了出來¹⁸。所謂「系統的研究」，就是摒棄了傳統學者述而不作、以選抄編排前人注疏為究竟的治學方式，而代之以審查材料的真偽、分析其中的意義、探究材料之間的內在關聯性和規律性，並全面而系統地把研究所得綜合地敘述出來。這又使陷在支離破碎、散漫而無所依歸的注釋迷霧中的馮友蘭，第一次找到了出路、摸著了頭緒，從而發見了中國古代哲學家的某些思想系統和中國哲學史發展的某些線索¹⁹。所有這些，都讓馮氏自覺「面目一新、精神為之一爽」²⁰。

同樣令馮友蘭感奮不已的，還是胡適在講授中國哲學史時流露出來的濃烈反傳統氣息——亦即《三松堂自序》所謂的「五四時代的革命精神」²¹。在馮友蘭看來，胡適的「革命精神」，首先表現在他悍然註銷了儒家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正統的地位，而只把儒家視為百家中的一家，與以往咸被視為「支與流裔」甚至是「異端邪說」的各種學術流派平起平坐。其次還表現在他竟敢在講義上，「把自己的話作為正文，用大字頂格寫下來，而把引用古人的話，用小字低一格寫下來」²²。因為，在胡適以前，中國的學術著作，都是把經典的原文作為正文用大字頂格寫下來，把自己的話，作為經典的注疏或附庸，用小字低一格寫下來。胡適這一「非聖無法」的大動作，實無異於思想上的公然造反。這種「以我為主」的「膽大妄為」，無論從形式上或精神上，都遠遠超過「六經注我」的陸象山。

馮友蘭負笈北大三年，首先是在黃侃的接引下，飽飫了傳統國學詞章之華

17 同前註，頁119-203。

18 同前註，頁201。

19 同前註，頁200-201。

20 同前註，頁201。

21 同前註。

22 同前註。

美²³；接著是在陳黻辰的誘導之下，瞥見了中國義理之學的奧秘²⁴；最後是在胡適的啓蒙之下，讓他整個學術生命忽然開了竅，跳脫出傳統學術的羈拘，窺見了現代學術的新天地²⁵。如果說，黃侃、陳黻辰等傳統學者曾把馮友蘭引進了中國詞章義理之學的新天地，現代學者胡適便讓馮友蘭窺見了西方方法學更新的天地。這兩重天地，對馮友蘭而言，後者的境界不僅要遠比前者更為充實、更為豐富、更為深刻，而且在位階上也要遠比前者更為優越和更為高級²⁶。在這兩重天地的強烈對照之中，馮友蘭發見了新文化和舊文化的矛盾和衝突²⁷，他無論是情感還是理智的天秤，都迅速向新文化的那一端傾斜。胡適到北大才剛兩個月，便因緣際會成了哲學研究所的創所所長²⁸，而馮友蘭立刻就選修了胡適在研究所講授的全部兩門功課²⁹。緊接著在三年級下學期，亦即馮氏行將畢業的最後一個學期，馮友蘭除了繼續胡適的這兩門課之外，在西學方面，還選修了沈步洲的語言學概論（三學時）、顧孟餘的經濟學原理（三學時）以及李石曾的社會哲學（二學時）³⁰。大量的選修西方的社會科學課程，顯示了馮氏的治學方向和興趣，已由傳統學問向西學轉移。直接促成馮友蘭思想轉向的老師就是胡適。

在胡適的影響下，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日，馮友蘭與陳鐘凡、孫本文、嵇明等十多位同學發起成立了北京大學哲學會，並「以商榷東西諸家哲學，淪啓新知為宗旨」³¹。這表明了馮氏已把個人對新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學的嚮往，提昇為同志間互助和互教的集體活動。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活動和政治活動往往是密切關聯的。同年五月二十一日上午，馮友蘭參加了北大學生抗議北洋政府與日本締結

²³ 同前註，頁35。

²⁴ 同前註，頁186-188。

²⁵ 同前註，頁119-203。

²⁶ 同前註，頁199-203。

²⁷ 馮友蘭把陳漢章和哲學門部分同學對胡適的譏笑和攻擊，看作是當時舊文化勢力對新文化運動的反撲。《三松堂自序》云：「也有不少人對於胡的這部書，發了些譏笑之詞，認為是膽大妄為……我們的教授（指陳漢章）說他不通……我們學生中間也有人說：『胡適膽大臉厚。』這些譏笑之詞，從反面說明，這部書在當時是作為新事物出現的。」（頁202）

²⁸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中旬，胡適在北大創辦哲學研究所，自任所長，時距胡適在同年九月十日出任北大教授剛好過了兩個月。耿雲志：《胡適年譜》（香港：中華書局，1986年），頁47-48。

²⁹ 馮友蘭當時選胡適的兩門課分別為「歐美最近哲學之趨勢」和「中國名學鉤沉」。見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頁24。

³⁰ 同前註，頁25。

³¹ 同前註，頁26。

軍事協定的集會，並和與會同學一道，不顧蔡元培的勸阻，步行前往總統府請願³²。這又說明了馮友蘭的一隻腳，已從書齋邁入社會，開始把學術思想轉化為政治行動了。同年六月底，馮友蘭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門，九月在開封出任河南第一工業學校語文、修身教員³³。但馮友蘭雖人在開封，卻心繫在胡適等領導下的北京的文化革命運動。他才一到開封任所，便立刻主編《心聲》雜誌³⁴，企圖把他由北京帶回的文化革命火種在河南點燃³⁵。他也曾多次投稿傅斯年等主編的《新潮》，直接為文化革命效力。一九一九年六月，馮友蘭考取了河南省公費留學，同年十二月乘搭中國郵船公司南京號海輪由上海抵達紐約，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哲學系繼續深造。馮友蘭之所以選擇了哥大而不是美國別的大學，原來又是遵照胡適的指示。馮友蘭在《四十年的回顧》云：「我要往美國去留學的時候，我找胡適，問美國哲學界的情況，學哲學上哪個大學比較好。他說，美國的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都是有名的，但是哈佛的哲學是舊的，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是新的，他本人就是在哥倫比亞學的新哲學。」³⁶由此，亦可見當時馮友蘭對胡適是何等的敬重和信服。

只是，馮友蘭到了大西洋彼岸，不僅在地理上遠離了胡適，而且在文化心理上也和胡適漸行漸遠。如果說，馮友蘭在北大時就像一隻關在黑井底下的青蛙，胡適方法學的啓蒙，等於揭開了井蓋，讓他窺見了頭頂上斗大的一片藍天。那麼，到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的馮友蘭，便如同青蛙跳出了深井，讓他真正看見了西方現代學術的天地之大，宮室之美。馮友蘭往昔對胡適的信服和崇拜，也因眼界漸寬而逐漸消滅。

當然，這還不是馮友蘭與胡適漸行漸遠的最重要原因。馮友蘭與胡適疏離的最重要原因有二。其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目睹西方文明內部的嚴重危機，西方的知識分子正開始對西方文化的種種弊端進行了深刻的反省。十九世紀以來風行一時的進步主義和科學主義已開始式微，昨日對西方文化的樂觀主義已漸漸被今日的悲觀主義所代替。戰後西方思想界的重大轉變，與當時中國思想界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五四風潮，形成了極強烈的反差。一旦中國的知識分子有機

³² 同前註，頁26。

³³ 同前註，頁28；以及馮友蘭：《三松堂自序》，頁46-47。

³⁴ 馮友蘭：〈回憶《心聲》雜誌〉，收入《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頁971。

³⁵ 馮友蘭：〈《心聲》發刊辭〉、〈《心聲》第二次復活〉，收入同前註，頁817-821、862-863。

³⁶ 馮友蘭：《四十年的回顧》，收入《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頁165。

會來到歐美，便再也無法對這種強烈的反差視若無睹。君不見就連洋人也承認西方文化並非一切都好麼？梁啟超和張君勱正是因為旅遊了一趟歐洲，才深感不宜妄自菲薄。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馮友蘭在美國留學，又豈能無動於衷！

其二是馮友蘭在哥大攻讀博士學位不及一年，便審時度勢，當機立斷地把自己的專業由西方哲學改為中國哲學。這一轉變，固然能使馮友蘭易劣勢為優勢，化被動為主動，在三年半的時間內順利完成學業並取得博士學位。但是，專業的轉變也往往會引起心態的轉變。馮氏在改變專業之後，便能以較為同情的態度，與中國的傳統經典及先哲進行內在對話 (internal dialogue)，而兒時曾背得爛熟的古典，其中隱而未顯的意義和價值，亦在內在的對話和思想的反芻中得以砥礪發明。所有這些，都使他離開胡適的「全盤性反傳統主義」越來越遠，而越來越貼近了他在北大的另一個老師——一生矢志要為中國傳統文化辯誣洗冤的當代新儒學開山梁漱溟。馮友蘭在一九二二年四月發表了他的第一篇英文論文“Why China Has No Science: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 (〈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後果的一種解釋〉)³⁷，以「能而未為」的理論來解釋中國文化何以「未能」產生科學³⁸，與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隔海唱和。一九二三年暑期馮友蘭完成博士論文“The Way of Decrease and Increase with Interpretations and Illustr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e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天人損益論》)，該論文改名為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 The Way of Decrease and Increase with Interpretations and Illustr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e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人理想之比較研究》)，於一九二四年冬由上海商務印書局出英文本，其後又於一九二六年九月由上海商務印書局出版中文本，書名被改為《人生哲學》³⁹。如果說，馮友蘭在〈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中，其辯護策略是強調中西文化的差異性，並以「各有所長，各有所短」為理由，替中國文化爭取平等地位；那麼，馮友蘭在《人生哲學》中，其辯護策略則是強調中西文化的共通性。在《人生哲學》所羅列的損道、益道和中道三大派中，每派都是由中國和西方的哲學流派共同組成的。儘管馮友蘭在表面上承認了每一派都各有所見，亦各有所蔽，但他還是把以先秦儒家和宋明新儒家為主體的中道派

³⁷ 該論文完成於一九二〇年冬，於一九二一年曾在哥大哲學系學術研討會上宣讀，於翌年四月刊於美國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32.3，一九八三年四月由涂又光譯為中文，收入馮友蘭：《三松堂學術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頁23-42。

³⁸ 同前註，頁24。

³⁹ 馮友蘭：《人生哲學》，收入《三松堂全集》（第一卷），頁347-584。

的位階和價值，置放在損道派和益道派之上，而斷定中道派是「其蔽似較少」的「較對之人生論」⁴⁰。約而言之，馮友蘭無非是要向讀者表明：西方文化所有的中國文化也有，但中國文化所有的比西方文化還要更好⁴¹。所有這些，都顯示出馮友蘭基本上已脫離了五四反傳統主義的營壘，而正式加入了新文化保守主義者的行列⁴²。

二、導火線

儘管馮友蘭在學術文化思想上已與胡適分道揚鑣，但直至他的《中國哲學史》（上冊）書稿寄呈胡適指教之前，亦即在一九二九年底之前，兩人仍維持著師生間的微妙關係。馮友蘭自一九二三年夏返國在河南大學哲學系任教，恆不安於位，亟思離開河南這個學術文化的邊緣地區，到其他學術文化中心謀一位置⁴³。他先後到過廣州的廣東大學、北京的燕京大學任教，最後得償所願，於一九二八年秋加入了羅家倫接收清華的領導班子，不但成了中國另一最高學府的教授，而且還先後在清華擔任過校秘書長、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代理校務（即代校長）等要職，變成了清華第二號人物⁴⁴。由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底，胡適曾與馮友蘭有書信往來，彼此也曾「暢談甚快」，胡適有新的著作也會寄馮友蘭一份⁴⁵。馮友蘭嘗多次投稿胡適主編的《現代評論》，多次把自己的論文寄呈胡適求教。

黃山書社出版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中，共收入的馮友蘭致胡適書函六通。此六函中有五函應撰於兩人關係尚算正常之時。馮友蘭在信中曾向胡適請求介紹工作，請求介紹出書，請求幫助通過中基會的補助等等。其時馮友蘭對胡適

⁴⁰ 馮友蘭在《人生哲學》云：「哲學多有所『蔽』；本書中所謂中道諸哲學，其『蔽』似較少。今依所謂中道諸哲學之觀點，旁採實用主義及新實在論之見解，雜以己意，糅為一篇，即以之為吾人所認為較對之人生論焉。」（頁509）

⁴¹ 馮友蘭在《四十年的回顧》說：「在《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裏面，我只是把各派哲學并列敘述，沒有明確地肯定，那一派是我所認為最有價值的。現在在《人生哲學》裏，我明確地肯定，我所謂中道，是最有價值的。」（頁179）

⁴² 關於馮友蘭由反傳統主義向文化保守主義轉變的心路歷程，詳見翟志成：〈馮友蘭徹底的民族主義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大陸雜誌》第98卷第1-3期（1999年1-3月），頁29-36、61-69、114-127。

⁴³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頁58-59。

⁴⁴ 同前註，頁59-76。

⁴⁵ 例如，馮友蘭在一九二五年獲胡適贈新出的《胡適文存二集》一套。見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頁56-57。

仍執弟子之禮，每封信末均著有「學生馮友蘭謹啓」或「學生馮友蘭鞠躬」等文字⁴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談馮沅君與陸侃如婚事的二封信。馮沅君原名馮恭蘭，是馮友蘭的胞妹，七歲喪父，在馮友蘭的影響下走上創作和研究中國文學的道路，畢業於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北大文科研究所，是中國著名的學者和女作家。馮友蘭對沅君極為憐愛，對沅君與陸侃如的婚事原來並不贊成。原因之一是陸侃如比沅君還小三歲，更重要的原因是馮友蘭經過調查，發現陸侃如在家鄉已與一莊姓女子訂有婚約，於是一怒之下曾指責陸家騙婚，因之與陸父鬧得極不愉快⁴⁷。爲了其妹的終生幸福，以「長兄如父」自任的馮友蘭甚至曾一度想過把沅君介紹給門當戶對，而其才學又讓自己佩服的陳寅恪⁴⁸。但此時沅君正熱戀她的「璧弟」（侃如），對其兄的「荒謬」之舉自然十分反感⁴⁹。不過，由於一心希望得到家中的祝福，沅君便請出自己在北大的師長胡適與蔡元培出面當調人。馮友蘭眼看其妹意不可回，而陸家又滿足了他提出的與莊家「登報解除婚約」加上「官廳登記」和「律師證明」等先決條件，也就樂得把人情和面子賣給胡適。他在一九二八年九月八日致胡適函云：「近接侃如來信，知與莊女士關係已斷，並經律師證明。學生即據以與家慈婉商，家慈雖仍不免疑慮，但已允聽舍妹自決，不加干涉，此事可謂告一結束，而先生執柯伐柯，亦於是告厥成功矣。」⁵⁰

但是，兩個學術思想南轅北轍，又在同一個地方治相近專業的人，要長久地和平共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俟胡適讀到馮友蘭寄來的《中國哲學史》書稿時，維繫著胡、馮兩人暫時相安無事的微妙的師徒關係便被撕裂了。在胡適而言，馮書不僅在精神上和自己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唱對臺戲，而且還用「釋古」的典範取代了自己書中所樹立的「疑古」典範⁵¹，簡直是要拆毀自己的學術招牌。我們知道，《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不僅是胡適藉以成名的最大學術

⁴⁶ 見馮友蘭：〈馮友蘭信六通〉，收入耿雲志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第36冊，頁591-603。

⁴⁷ 見馮沅君：〈馮沅君信八通〉（二），同前註，頁606-607。

⁴⁸ 見同前註，頁606。

⁴⁹ 馮沅君在致胡適函云：「芝生來信介紹陳寅恪給我，這種辦法未免太荒謬，我決意謝絕。」並向胡適舉證其兄的「調查報告」是如何如何地「不盡可信」（同前註）。

⁵⁰ 引自馮友蘭：〈馮友蘭信六通〉（四），頁596-597。

⁵¹ 關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中的「疑古」典範如何被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中的「釋古」典範所取代，筆者在〈師不必賢於弟子：論胡適與馮友蘭的二本中國哲學史〉一文中已作了相當深入的探究與分析，於此不贅。該文將刊於《新史學》第15卷第3期（2004年9月）。

資本，而且還是胡適反傳統的最重要武庫⁵²。胡適已習慣於把別人對這本書的批評，看成是反動的文化勢力對革命陣營的反撲。以前他對梁啟超的批評便秉持著這種看法。他在一九二一年初致陳獨秀函云：

你在北京的日子也很久了，……你難道不知我們在北京也時時刻刻在敵人的包圍之中？你難道不知他們辦共學社是在《世界叢書》之後，他們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們拉出他們的領袖來「講學」——講中國哲學史——是專對我們的？（他在清華的講義無處不是尋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書之處，從不說一聲；他有可駁我的地方，決不放過……）你難道不知道他們現在已收回從前主張白話詩文的主張？（任公有一篇大駁白話詩的文章，尚未發表，曾把稿子給我看，我逐條駁了，送還他……）你難道不知延聘羅素、倭鏗等人的歷史？（我曾宣言，若倭鏗來，他每有一次演說，我們當有一次駁論。）⁵³

現在面對馮書的挑戰，胡適除了想到這是反動勢力的反撲之外，還極可能想到這是學生對老師和文化革命的背叛。既然對反動必須予以打擊，對叛徒更是不能寬恕，胡適對馮友蘭的打壓，便不再念及師生的情誼。對馮友蘭而言，在私方面，他之所以能在數年間變成了學術的主流派，全憑自己的努力和爭氣，而胡適對此並無給予多大的幫助，他對胡適並無虧欠；在公方面，學術文化本是天下公器，他與胡適所爭者，乃係中國學術文化之大是大非，孔門素有「當仁不讓於師」的遺教，西哲亦有「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之明訓，又豈可以私誼以害公義！職是之故，馮友蘭對自己與胡適的論辯也只有據理力爭，寸步不讓。兩人由是一來一往地互相批駁，彼此的關係也就變得越來越僵。

兩人之中，胡適最強的一項是考據，最弱的一環是義理；而馮友蘭的強項是義理，較弱的一環是考據。但胡適在哲學上雖非真正內行，對於「以己之長，攻彼之短」的哲學卻頗不外行。他注意到馮書把《老子》一書考訂為戰國時人作品，故其作者應出生在孔子之後，與自己的書把《老子》的作者考訂為孔子的前輩，故《老子》成書應在《論語》之前的論斷相舛，因而乘機在《老子》的年代這一考據上的問題向馮友蘭發難，藉由一點突破以推翻全面。關於胡、馮兩人論爭的細節，本文限於篇幅無法詳加探究，而只能從整體上略加裁斷。

⁵² 詳見翟志成：〈中國當代學術典範的建立：救亡思潮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新亞學報》第20期（2003年10月），頁135-200。

⁵³ 胡適：〈致陳獨秀〉，收入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上冊，頁262。

馮友蘭的所長雖不在考據，但對考據卻不外行。他對於《老子》書成於戰國的判斷，乃係綜合自崔東壁、汪中、梁啟超等人對《老子》書及其作者的辨偽和考證成果。馮友蘭在書中特別強調：「此三端及前人所已舉之證據，若只任舉其一，則不免有為邏輯上所謂『丐詞』(begging the question)之嫌。但合而觀之，則《老子》之文體，學說及各方面之旁證，皆指明其為戰國時之作品，此則必非偶然矣。」⁵⁴而胡適則緊揪著這句話不放，強調若所有證據分而觀之不免有為「丐詞」之嫌，則雖「合而觀之」亦不能確定「其為戰國時之作品」⁵⁵。

胡適的推理並沒有錯，馮友蘭的「合而觀之」法究其實並不能百分之百地確定《老子》是戰國時作品。但胡適的正確推理並沒能給自己帶來勝利。因為，按照胡適的嚴格地「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的硬性規定⁵⁶，胡適自己就是在沒能提供「充分證據」的情勢之下，仍舊在其《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裏把《老子》的成書安排在《論語》之前。換句話說，胡書中「老先孔後」的說法，和馮書中「孔先老後」的說法，都只不過是未能被完全證實的假設，而決不應被視為定論。既然胡適和馮友蘭都無法提供充分的確鑿證據，證成自己的假設，那麼，他們的假設的孰優孰劣，便只能由其「被證成的可能性」的大小來決定。馮書使用了「合而觀之」法，當然能大大增加了其假設「被證成的可能性」，因而又要比其假設「被證成的可能性」較小的胡書高明⁵⁷。

即使以自己最引以為傲的考據，胡適還是沒有辦法壓倒馮友蘭。在當時參加《老子》辯論的學者如梁啟超、錢穆、顧頡剛諸人，幾乎都一致反對胡適「老先孔

⁵⁴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重慶：商務印書館，1944年)，上冊，頁210-211。

⁵⁵ 見胡適：〈與馮友蘭先生論《老子》問題書〉，原載《大公報》(文學副刊)，1931年6月8日，收入章清、吳根樑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下冊，頁742-744。

⁵⁶ 見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文選》(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頁2。

⁵⁷ 馮友蘭在一九三〇年中覆胡適函云：「學生本認為每條辯論，若只就其自身觀之，皆有丐辭之嫌也。學生所注重者，只在合而觀之，蓋合而觀之，則可成一系統。如能成一系統，則可以站得住也。自邏輯及科學方法言之，每一辯論，若只就其本身言，多為證據不充分。如吾人見一部分人有死，而謂凡人皆有死，嚴格言之，其證據為不充分，即演繹法中之AAA命題，亦有丐辭之嫌。但此辯論如能合別辯論而成一系統，則可成立矣。吾人今日談上古史文獻不足，有許多問題本不能有決定的結論，然吾人亦不能永遠展緩判斷。例如吾人講哲學史，必將老子放一地位，於此時吾人只能將其放在與吾人心目中之上古史系統相適合之地位，此亦無可如何者也。……」其實已點出了假設不等同於定論此一關鍵問題，但可惜說得還不夠清楚，也未能把道理講透。引自馮友蘭：〈馮友蘭信六通〉(五)，頁599-602。

後」的論點⁵⁸。胡適的羞怒和挫折感是可想而知的⁵⁹。胡適很可能沒有覺察到，他的書中「老先孔後」的說法，只不過是一未經證實的假設，而他卻一直把這一未經證實的假設，當成了已經被證成的定論，如此一來便違背了他自己一貫教人要「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的「思想和學問的方法」⁶⁰。並且，他一再以未能提供「充分證據」為理由，以挑剔和否定馮友蘭等人「孔先老後」的假設之時，卻忘記了自己也同樣地未能提供「充分證據」，忘記了自己所堅持的「老先孔後」也只不過是假設，忘記了自己的假設並沒有比馮友蘭的假設更具優越性。正因如此，胡適把他和馮友蘭關於《老子》成書時代的爭論，分別寫入了他批評馮友蘭的中英文的相關文章中，藉以突顯馮友蘭的荒謬可笑，殊不知卻更突顯了自己錯認假設為定論的謬誤。例如，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臺北版自記〉中說：

在民國六年我在北京大學開講中國哲學史之前，中國哲學是要從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講起的。據顧頡剛先生的記載，我第一天講中國哲學史從老子、孔子講起，幾乎引起了班上學生的抗議風潮！後來蔡元培先生給這本書寫序，他還特別提出「從老子、孔子講起」這一點，說是「截斷眾流」的手段。其實他老人家是感覺到應該說幾句話替我辯護這一點。

四十年來，有些學者們好像跑到我的前面去了。他們要進一步，把老子那個人和《老子》那部書都推翻，都移後兩三百年。……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就是這樣辦的。……

馮先生舉出的證據實在都不合邏輯，都不成證據。我曾對他說：「……積聚了許多『邏輯上所謂「巧詞」』，居然可以成為定案的證據！這種考據方法，我不能不替老子和《老子》書喊一聲『青天大老爺，小的有冤枉上訴！』聚蚊可以成雷，但究竟是蚊不是雷。證人自己承認的『巧詞』，究竟

⁵⁸ 詳見胡適：〈與錢穆先生論《老子》問題書〉和〈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收入章清、吳根樑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下冊，頁745-767。

⁵⁹ 致令胡適在北大講堂，講出了「我反對老聃在孔子之後的說法，因為這種說法的證據不足。如果證據足了，我為什麼反對？反正老子並不是我的老子」諸如此類負氣的話。見馮友蘭：《三松堂自序》，頁206。

⁶⁰ 參見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頁17。胡適在該文中還強調：「科學方法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沒有證據，只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夠，只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後，方才奉為定論。」（頁17）但胡適在其《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中，卻在「證據不夠」又「未經證實」的情勢下，仍「武斷」地將其「老先孔後」的假設「奉為定論」，直接違背了他一輩子宣傳的「科學方法」和十字真言。

是『巧詞』，不是證據。」

這是在二十五年前說的話。我到今天，還沒有看到這班懷疑的學人提出什麼可以叫我心服的證據。所以我到今天還不感覺我應該把老子這個人或《老子》這部書挪移到戰國後期去。……⁶¹

其實，馮友蘭提出的證據，並非如胡適所謂「都不合邏輯，都不成證據」，而是一些藉以證成「孔先老後」的可能例證。這些可能例證，若分而觀之，固然不足以證明「孔先老後」（有關這一點馮友蘭已公開承認），但若合而觀之，則能使證成「孔先老後」的可能性大大增強——儘管合眾例證仍不能「完全而充分地」證成「孔先老後」（有關這一點馮友蘭已提及，但說得不夠清楚）。胡適若因為馮友蘭不能「完全而充分地」證成「孔先老後」，而拒絕把馮友蘭的假設視為定論，拒絕在自己的書中「把老子這個人或《老子》這部書挪移到戰國後期去」，這是胡適個人的自由，也無可厚非。但胡適在沒有提供充分證據的情勢下，無權把自己「老先孔後」的假設視為定論，也無權要求馮友蘭除非握有百分之百的充分證據始能另行提出「孔先老後」的新假設，更無權禁止馮友蘭因自己的假設能被證成的可能性較大而自覺其優越。箇中道理，本是一清二楚，胡適卻偏偏對如此顯明的道理視而不見，並大半輩子在這一問題上糾纏不休，這可能因為關心則亂的緣故吧。

三、胡適的馮友蘭情結

（一）「哲學關門」論

胡適雖以《中國哲學史大綱》「暴得大名」，但胡適的哲學訓練，卻常變成了某些中國專業哲學家清談的笑料。例如，金岳霖直到晚年撰寫回憶錄時，還不忘狠狠地幽了胡適一默：

我認識的人不多，當中有些還是應該研究研究。胡適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大懂他。我想，他總是一個有很多中國歷史知識的人，不然的話，他不可能在那時候的北大教中國哲學史。顧頡剛和傅斯年這樣的學生，都是不容易應付的。

這位先生我確實不懂。我認識他很早的時候，在一天他來找我，具體的事忘了。我們談到necessary時，他說：「根本就沒有什麼必須的或必然的事

⁶¹ 引自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臺北版自記，收入章清、吳根樑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上冊，頁6-7。

要做」。我說：「這才怪，有事實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論上的必然……」。我確實認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學的呀！

還有一次，是在我寫了那篇〈論手術論〉之後。談到我的文章，他說他不懂抽象的東西。這也是怪事，他是哲學史教授呀！

哲學中本來是有世界觀和人生觀的。我回想起來胡適是有生觀，可是，沒有什麼世界觀的。看來對於宇宙，時空，無極，太極……這樣一些問題，他根本不去想；看來他的頭腦裏也沒有本體論和認識論或知識論方面的問題。他的哲學僅僅是人生哲學。對這個哲學的評價不是我的回憶問題。⁶²

不知是否因為哲學家們對自己的輕蔑，還是因為受了馮友蘭的刺激，受辱和挫折讓一貫以聰明自負又眼高於天的胡適，對哲學和哲學家都產生了強烈的反感；而此一反感，又反過來增強了胡適本來就十分強烈的作為歷史家的驕傲和優越感，遂演成了一種「歷史的傲慢」。懷著「歷史的傲慢」，胡適見到哲學家往往出言不遜，甚至還曾一度設想運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取消北京大學的哲學系，讓北大的哲學家沒有飯吃。據哲學家賀麟回憶道：

在九一八事變後，他曾大唱其「哲學要關門」，「哲學家沒有飯吃」的論調。他那時曾在北京協和醫學院作了一個英文的演講，（講稿曾在當時北京英文報上發表）大發其「哲學是壞的科學」的荒謬議論。他從孔德的反動的實證主義出發，認實證科學已代替了哲學，哲學已沒有研究的領域，並以黑格爾學派的解體，作為哲學上的「樹倒猢猻散」，哲學要關門的例證……每遇見一個專門研究哲學的人，他就一再問他：「你何不早些改行？」他在當時北京大學所講授的「中國哲學史」課堂上，每年照例要重述一遍他的「哲學要關門」的荒謬議論。他甚至打算取消北京大學哲學系，想把個別順著他作哲學史考據的教授轉移到歷史系，而迫使其他哲學教師「改行」或「沒有飯吃」。北大哲學系雖未被取消，但當時唯一用新觀點講授「左派王學」相當受學生歡迎的嵇文甫先生卻被迫離開北京大學了。⁶³

⁶² 引自金岳霖：〈回憶錄·胡適，我不大懂他〉，《金岳霖文集》（第四卷）（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740。

⁶³ 引自賀麟：〈兩點批判，一點反省〉，收入三聯書店編：《胡適思想批判》（第二輯）（北京：三聯書店，1955年），頁90。

賀麟這些話雖是在中共一九五五年批胡適高潮時所說的，但剔除其其中的大批判語言，他所說的基本上與事實相符。因為，賀麟的話已經在錢穆的回憶錄中得到證實，胡適確曾一度計畫要把北大哲學系關掉，甚至要以歷史系取代整個文學院。錢穆說：「在余初到之年（翟按：即在一九三一年秋），北大歷史系第一次開會，適之為文學院院長，曾言辦文學院其實則只是辦歷史系。因其時適之已主張哲學關門，則哲學系宜非所重。又文學系仍多治舊文學者掌教，一時未能排除。……」⁶⁴除了逼走嵇文甫，胡適還不顧湯用彤和錢穆的反對，執意解聘了理學大家蒙文通。據錢穆回憶：

某日，……適之告余，秋後文通將不續聘。余答，君乃北大文學院長，此事與歷史系主任商之即得，余絕無權過問。且文通來北大，乃由錫予推薦。若欲轉告文通，宜以告之錫予為是。而適之語終不已，謂文通上堂，學生有不懂其所語者。余曰，文通所授為必修課，學生多，宜有此事。班中學生有優劣，優者如某某幾人，余知彼等決不向君有此語。若班中劣等生，果有此語，亦不當據為選擇教師之標準。在北大尤然。在君為文學院長時更應然。適之語終不已。余曰，文通所任，乃魏晉南北朝及隋唐兩時期之斷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離職，至少在三年內，當物色不到一繼任人選。其他余無可言。兩人終不懽而散。文通在北大歷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終未去適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⁶⁵

蒙文通原是四川經學大師廖平的傳燈高弟，後來又曾負笈於支那內學院佛學大師歐陽漸門下，文史哲一身兼通，於宋明理學與佛學之造詣尤為深邃，在北大任教時常與文化保守主義者林宰平、熊十力、錢穆、湯用彤等人聲應氣求。從他在北平時向不入胡適的家門的「稀有之事」看來，他對胡適及胡適的學問大概也無甚敬意。胡適之所以解聘蒙文通，當然也絕對不會僅僅是因為有學生投訴「不懂其所語」。因為，當時普通話尚未普及，北大的教師各操家鄉方言授課，而蒙文通所操者屬於成都官話系統，又要比北大許多教師的家鄉方言易懂得多，至少要比錢穆的無錫話易懂得多⁶⁶。蒙文通被解聘的真正原因，極可能是由於他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堅定立場而又敢於放言高論，遂使自己成了胡適的眼中釘。為了達

⁶⁴ 引自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6年），頁147。

⁶⁵ 引自同前註，頁156。

⁶⁶ 筆者曾在一九八四年八月於臺北內雙溪錢寓晉謁，蒙錢先生接待並賜談一小時，由於聽不懂錢先生所操之語，需蒙何佑森學長代為翻譯。

成把文學院辦成歷史系的目標，胡適還以「革新」之名在北大中文系解聘了舊派老教授許用晦和林損⁶⁷。回想到胡適在二十年代初期才剛掌北大文學院大權，便一口氣解聘了包括保皇分子辜鴻銘在內的八個教師⁶⁸，由蔡元培一手開創的兼容並包的北大自由講學的學風，到了胡適手中便受到了嚴重的壓抑。以胡適愈來愈嚴重的「歷史的傲慢」情結，及其肅整「不適任教師」之鐵腕，倘若馮友蘭在北大任教，不知是否亦會被胡適解聘，而落得個「沒有飯吃」的下場？

(二)「天下蠢人恐無出芝生右者」

但是，「各人頭上一片天」，胡適雖在北大有權有勢，卻還真奈何不了已經在清華打下了一片鐵桶江山的馮友蘭。眼看著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在出版完上冊之後，不久又出齊了下來，而自己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在出版了十多年之後，還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寫出下冊；更兼陳寅恪和金岳霖所寫的揚馮貶胡的三篇「審查報告」，又都附在馮書之後，使得學界幾乎一邊倒地認為馮書要遠遠勝過己書。所有這些，都讓胡適氣憤難平。既然公開寫批判文章占不了便宜，胡適又會用什麼法子對付馮友蘭呢？據周作人的說法，胡適在背地裏搬弄是非，攻擊別人，在熟朋友中是頗有名氣的。周作人曾把胡適和素以使酒罵座，惡名昭彰的黃侃作一比較：

他（黃侃）的攻擊異己者的方法完全利用謾罵，便是在講堂上的罵街，它的騷擾力很不少，但是只能夠煽動幾個聽他的講的人，講到實際的蠱惑力量，沒有及得後來專門說閒話的「正人君子」的十一號了。⁶⁹

引文所謂的「正人君子」，原是魯迅諷刺胡適的話，蓋胡適在人前常擺出一副「gentleman的臭架子」也⁷⁰。「十一號」是胡適寓所的門牌號碼，胡適曾長期住在北平鐘鼓寺十一號，直至一九二六年三月七日始搬離⁷¹。

周作人原是胡適極熟的朋友，他認為「正人君子」胡適在別人背後「專門說閒話」的蠱惑力和殺傷力，還要遠遠大於黃侃，這只是他個人的感受，是否公允還需作進一步的考證。但若以胡適對付馮友蘭的事例加以印證，則周作人的話似

⁶⁷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收入唐文一、劉屏主編：《往事隨想·周作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235。

⁶⁸ 詳見胡適：〈致顧孟餘〉，收入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頁305。

⁶⁹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頁232。

⁷⁰ 胡適：〈胡適致蘇雪林〉，頁339。

⁷¹ 見白吉庵：《胡適傳》，頁233-234。

乎並沒有「厚誣」胡適。

日記有兩種，一種是不打算寫給別人看的，一種是寫給別人看的。胡適的日記，不但是寫給別人看的，而且還知道日後一定會出版的。正因如此，他在日記中謾罵別人，和他在背後「專門說閒話」並無甚不同。胡適在日記中攻訐馮友蘭的地方有好幾處。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二日《胡適日記》有云：

這幾天讀張其昀君借給我看的《思想與時代》月刊……

這是張君主編的，錢是蔣介石先生撥助的，其中主重〔要〕人物為張其昀、錢穆、馮友蘭、賀麟、張蔭麟。他們沒有「發刊辭」，但每期有啓事，「歡迎下列各類文字：

1. 建國時期主義與國策之理論研究。
2. 我國固有文化與民族理想根本精神之探討。
- 3.—6. (從略)」

這兩條就是他們的宗旨了。……

張其昀與錢穆二君均為從未出國門的苦學者，馮友蘭雖曾出國門，而實無所見。他們的見解多帶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甚明，而擁護集權的態度亦頗明顯。⁷²

胡適是個頗為徹底的反傳統主義者。任何人只要在胡適面前肯定中國歷史文化的正面意義和價值，均有可能被胡適謾罵、鄙薄和不屑。例如有個湖南的留法學生向胡適請教：「〈中庸〉上說的『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話怎麼解？究竟確不確？」弄得胡適又好笑，又好氣，在日記中狠狠地嘲笑他「到了法國七年，法文還不曾學會，卻記得這些昏亂的胡話」⁷³！又例如胡適有一天與一熟朋友飯後一起去看莊士敦 (Johnston)，閒談中，胡適聽到該朋友說「中國文學勝於西洋」，氣得在日記中大罵他「見解甚陋，貽笑於外人」⁷⁴。甚至是「外人」如牛津之教授 Jenkin 與牛津之錫蘭學生會會長及印度學生會會長等在胡適面前稱許中國和東方文化，也讓胡適聽來十分逆耳，在日記中認定他們「裝腔作勢」，「說的話不是良心話」⁷⁵！胡適習慣於把維護傳統文化與愚昧、保守、反動畫上等號，《思想與時代》的編者和主要撰稿者既以「我國固有文化與民族理想根本精神之探

⁷²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7冊，頁539-540。

⁷³ 同前註，第4冊，頁266。

⁷⁴ 同前註，頁369。

⁷⁵ 同前註，頁380-381。

討」為其宗旨，自然難免要被胡適畫入「愚昧」、「反動」、「保守」和「擁護集權」的另冊。但在所有人當中，胡適又最鄙薄馮友蘭。因為，胡適知人論世極看重學歷和出身。像錢穆、張其昀這一類沒有留過洋的「苦學者」，胡適表面雖客客氣氣，其實在心中卻頗為輕視，認為其人不足以與語大道。但馮友蘭既畢業於北大，又是哥大的洋博士，居然還和這些未見過世面，未聞大道的土學者一道宏揚傳統文化，在胡適看來，簡直是愚不可及，白吃了許多洋麵包和枉讀了好幾年洋書。

胡適從來就以聰明自負，並常以自己為標尺去衡量他人。在他看來，真正聰明的人都應像他那樣反傳統；而維護傳統的只有兩種人，一種是被蠢人所誤的聰明人，如梁啟超⁷⁶，另一種是不折不扣的蠢人，如馮友蘭。早在一九三一年春，胡適和錢穆討論老子問題，就突然冒出這麼一句：「天下蠢人恐無出芝生右者」⁷⁷。不知胡適所謂的天下第一至蠢，是指馮友蘭堅持「孔先老後」的蠢？抑或身為洋博士還去維護中國傳統的蠢？還是指馮友蘭不知「正統派」的今典上了胡適的當猶不自知的蠢⁷⁸？當錢穆晚年把胡適的這句話寫入了回憶錄時，胡適墓木已拱，而馮友蘭尚還健在。據馮友蘭的學生鍾肇鵬說：

一九八七年秋，一次我到馮老家中，談到最近我讀了錢賓四所寫的《師友雜憶》，其中有講到馮先生的。賓四記胡適謂「天下蠢人恐無出芝生右者。」先生聽後，默然良久，曰：「胡適頂聰明，但他『作了過河卒子，只得勇往直前』。我卻不受這種約束。」⁷⁹

馮友蘭雖不像胡適那樣自負聰明，但也絕不會想到自己和「愚蠢」二字有任何關聯。他做夢也不曾想到，胡適竟會把他列為「蠢人」，而且還位居天下第一。大概是鍾肇鵬並沒有把胡適說此話的時間、地點和脈絡交代清楚，致令馮友蘭想來想

⁷⁶ 胡適在一九二九年二月二日在《日記》中曾對梁啟超作「蓋棺定論」，認為梁一生中「最不朽的功績」和「最大貢獻」在於其《新民論》，因為「《新民說》篇篇指摘中國文化的缺點，頌揚西洋的美德可給我國人取法」並惋惜「他晚年的見解頗為一班天資低下的人所誤，竟走上衛道的路上去，故他前六七年發起『中國文化學院』時，曾有『大乘佛教為人類最高的宗教；產生大乘佛教的文化為世界最高的文化』的謬論。此皆歐陽竟無、林宰平、張君勱一班庸人誤了他。他畢竟是個聰明人，故不久即放棄此計劃。」同前註，第5冊，頁354-355。

⁷⁷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138。

⁷⁸ 胡適罵馮友蘭為「正統派」之事詳見下文第四節。

⁷⁹ 引自鍾肇鵬：〈片斷回憶和一點想法〉，馮鍾璞、蔡仲德編：《馮友蘭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349。

去，最後竟想到了自己在中共立國前夕，沒有像胡適那樣逃離大陸，因而後來在中共治下受盡折磨，胡適一定是因為我馮友蘭不曾像他那樣作了逃亡的「過河卒子」，從而斷定我是天下第一蠢人吧？馮友蘭的猜想，簡直離題萬里！

(三)「正統派」的惡謚

胡適曾一再宣稱，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的主要觀點是「正統派」的。此事具載於馮書的〈自序二〉：「此書第一篇出版後，胡適之先生以為書中之主要觀點係正統派的。今此書第二篇繼續出版，其中之主要觀點尤為正統派的。此不待別人之言，吾已自覺之。」⁸⁰馮友蘭當然知道胡適口中的「正統派」並不是什麼恭維的好話，他整篇序文也是運用「正、反、合」的辯證觀點反覆替自己辯護。但他可能還不知道，胡適的「正統派」是有「今典」可本的，這「今典」就出於梁啟超著名的《新史學》中的〈論正統〉一文。胡適早年曾極端崇拜梁啟超，直到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日他在日記中還是這樣寫道：「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詩『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時』，此二語惟梁氏可以當之無愧。」⁸¹從早年胡適對梁啟超的無任景仰和崇拜，若說他竟會沒有讀過梁氏著名的《新史學》中〈論正統〉一文，實在是無法令人相信！梁啟超在該文中說：

中國史家之謬，未有過於言正統者也。言正統者，以為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於是乎有統。又以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於是乎有正統。統之云者，殆謂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云者，殆謂一為真而餘為偽也。千餘年來，陋儒斷斷於此事，攘臂張目，筆鬪舌戰，支離蔓衍，不可窮詰。一言蔽之曰，自為奴隸根性所束縛，而復以煽後人之奴隸根性而已。……故夫統之云者，始於霸者之私天下，而又懼民之不吾認也，乃為是說以箝制之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吾生而有特別之權利，非他人所能幾也。」……統之既立，然後任其作威作福，恣睢蠻野，而不得謂之不義。而人民之稍強立不撓者，乃得坐之以不忠不敬大逆無道諸惡名，以鋤之摧

⁸⁰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自序（二）》，頁1。

⁸¹ 引自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1冊，頁180。

之，此統之名所由立也。……故泰西之良史，皆以敘述一國國民系統之所由來，及其發達進步盛衰興亡之原因結果為主，誠以民有統而君無統也。藉曰君而有統也，則不過一家之譜牒，一人之傳記，而非可以冒全史之名，而安勞史家之嘵嘵爭論也。然則以國之統而屬諸君，則固已舉全國之人民，視同無物，而國民之資格，所以永墜九淵而不克自拔，皆此一義之為誤也。故不掃君統之謬見，而欲以作史，史雖充棟，徒為生民毒耳。……凡數千年來嘵嘵於正不正偽不偽之辯者，皆當時之霸者與夫霸者之奴隸，緣飾附會，以保其一姓私產之謀耳。時過境遷之後，作史者猶懷他人之慨，斷斷焉辯得失於雞蟲，吾不知其何為也。……陋儒之說，以為帝王者聖神也。陋儒之意，以為一國之大，不可以一時而無一聖神焉者，又不可以同時而有兩聖神焉者。當其無聖神也，則無論為亂臣為賊子為大盜為狗偷為仇讎為夷狄，而必取一人一姓焉，偶像而尸祝之曰：此聖神也！……當其多聖神也……擇取其一人一姓而膜拜之曰：此乃真聖神也……諺曰：「成即為王，敗即為寇。」此真持正統論之史家所奉為月旦法門者也。⁸²

正由於不知胡適的「正統派」是如此刻毒的罵人語，馮友蘭一時不察，在下完了一番定義之後，竟然以新「正統派」自居。胡適眼看馮友蘭上了自己的當，變成了「自為奴隸根性所束縛，而復以煽後人之奴隸根性」的「陋儒」猶蒙在鼓裏，心中亦難掩其得意。日後胡適每批評馮書，總要重彈「正統派」的舊調。例如，他在〈《中國哲學史大綱》臺北版自記〉中，談到他多年前與馮友蘭關於《老子》成書年代的爭論的公案，突然話鋒一轉，充滿譏刺地說：

二三十年過去了，我多吃了幾擔米，長了一點經驗。有一天，我忽然大覺大悟了！我忽然明白：這個老子年代的問題原來不是一個考據方法的問題，原來只是一個宗教信仰的問題！像馮友蘭先生一類的學者，他們誠心相信，中國哲學史當然要認孔子是開山老祖，當然要認孔子是「萬世師表」。在這個誠心的宗教信仰裏，孔子之前當然不應有個老子。在這個誠心的信仰裏，當然不能承認有一個跟著老聃學禮助葬的孔子。

試看馮友蘭先生如何說法：「……在中國哲學史中，孔子實佔開山之地位。後世尊為惟一師表，雖不對而亦非無由也。由此之故，此哲學史自孔

⁸² 引自梁啟超：《新史學》，收入《飲冰室合集》（上海：上海中華書局，1932年），文集，第4冊，頁20-24。

子講起。」(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頁二九)

懂得了「雖不對而亦非無由也」的心理，我才恍然大悟，我在二十五年前寫幾萬字的長文討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真是白費心思，白費精力了。⁸³

胡適的這一段〈自記〉，可以說是借絃而歌，譏刺之中又暗藏有譏刺，其中的象外之意，絃外之音，必須與梁啟超的〈論正統〉一文對照著互相訓讀，始能究明其底蘊。試想想看，孔子在歷史上曾被推尊為和「大成至聖」、「玄聖」和「素王」，如果把胡文中的「孔子」和梁文中的「帝王」互換，則梁啟超對「正統派」的種種痛斥和攻訐，移用到馮友蘭身上，可謂斤兩悉稱、毫釐不爽。原來馮友蘭之所以不承認胡書中「老先孔後」的「定論」，只不過是認定了「一國之大，不可以一時而無一聖神焉者，又不可以同時而有兩聖神焉者」，完全是其頭腦中「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的「正統派」的「宗教信仰」在作祟；原來馮友蘭之所以要撰《中國哲學史》，其目的不過是要取孔子「一人一姓焉，偶像而尸祝之曰：此聖神也」；原來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只不過是孔子「一家之譜牒，一人之傳記，而非可以冒全史之名」。正因如此，馮友蘭之所以要反對胡適「老先孔後」的「定論」，便「不是一個考據方法的問題，原來只是一個宗教信仰的問題」。對馮友蘭這種「緣飾附會」，以「正統之謬見」寫出來的「徒為生民毒」的哲學史，胡適若還要目之為學術著作，與之「嘵嘵爭論」、「斷斷焉辯得失於雞蟲」，當然「真是白費心思，白費精力了」。

(四)「毀滅性」的英文書評

在胡適的日記中，至少有兩處在攻評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

前些時曾見馮友蘭的“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國哲學簡史》〕，實在太糟了。我應該趕快把《中國思想史》寫完。⁸⁴

我們知道，馮友蘭的*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本是由他於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間在美國賓州大學講授「中國哲學史」時的英文講義整理而成的。由於該書其實是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精華版，故不特史料精熟，選材精當，而作者更能充分發揮其以簡御繁的特出本領，把數千來中國哲學史上各家各派的源

⁸³ 引自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臺北版自記》，頁8。

⁸⁴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8冊，頁7。

流演變及其精神面貌講得頗為透切精闢，故馮氏在該書〈自序〉自謂其書「譬猶畫圖，小景之中，形神自足……讀其書者，乃覺擇焉雖精而語焉猶詳也」⁸⁵。此言雖有自伐之嫌，但亦不失其實。是以該書於一九四八年出版後，極受中外學界推重，除英文之外，尚有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南斯拉夫文、捷克文、日文、韓文、中文等十二種不同文字的譯本行世。這本雖「小」而實「大」的書，由於作者是馮友蘭之故，在胡適眼中自然是「實在太糟了」。

在此之前，胡適還希望能藉楊聯陞之手批判馮友蘭。楊聯陞本畢業於清華經濟系，於四十年代中在哈佛東亞系攻讀博士學位，學成後留在哈佛任教，其人學殖深厚、知識淵博，極為胡適所器重，成了胡適在晚年與之「論學談詩」的最親密學生。但楊聯陞負笈清華之時，馮友蘭正擔任文學院院長，因馮友蘭在清華開講的「倫理學」是必修課，故楊聯陞極可能修過馮友蘭的課，不僅在名義上，而且在事實上也是馮友蘭的學生。楊聯陞對馮友蘭本無惡感，他曾於一九四六年聖誕新年假期在康橋與馮友蘭等人過從，「無話不說，無說不話」，聽「馮先生談了許多學生運動的情形」⁸⁶，楊聯陞在哈佛教授「近代文選」（每周五小時），還特別選用了「梁任公《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跟馮友蘭的《新事論》作教本」⁸⁷。我們知道，《新事論》中本有大量抨擊五四反傳統主義的文字，而楊聯陞竟用之為哈佛教材，可見楊氏當時在學術文化思想上與馮友蘭並無對立，甚至還極可能引馮友蘭思想為同調。是故當楊聯陞寄來他評馮友蘭的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的英文書評，讓胡適讀後不但大失所望，而且還大為光火。他在答楊聯陞函中，其語氣一反一貫的客客氣氣，而一變為十分的尖刻凌厲：

你評馮芝生的書，未免筆下太留情了。這種沒有歷史眼光的書，絕對夠不上“authoritative & comprehensive account”，更不是“a well-balanced treatment of the important schools”。他一字不提「顏李學派」，可見他無見識。他接受了Northrop 的胡說作綱領，更是好笑！⁸⁸

但胡適對楊聯陞的助攻畢竟還保留著一絲希望。當他知道楊聯陞在一九五四年底曾寫了一篇批評卜德 (Derk Bodde) 翻譯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英文書評，便忍

⁸⁵ 見馮友蘭著，涂又光譯：〈自序〉，《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1。

⁸⁶ 見楊聯陞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四日致胡適函，收入胡適紀念館編：《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頁74-75。

⁸⁷ 見楊聯陞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致胡適函，同前註，頁82。

⁸⁸ 引自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九日胡適致楊聯陞函，同前註，頁99。

不住修書向楊聯陞索取。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胡適致楊聯陞、勞榘函云：「又Bodde 譯的馮芝生《哲學史》，楊公曾有書評，現尋不著單本，倘有存本，乞再賜一份。」⁸⁹但當胡適讀到了楊聯陞寄來的書評校樣⁹⁰，不禁徹底失望了。原來楊聯陞只是蜻蜓點水般地批評了馮書在佛學一環稍弱之後，其主要的興趣和篇幅，端在與卜德討論英文翻譯中的技術性和支節性的瑣碎問題⁹¹。對胡適而言，楊文不僅沒能打中馮書的要害，甚至連隔靴搔癢也談不上，於是便只有親自出手。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胡適日記》云：

舊歷乙未元旦。

我早起忽然水瀉了八九次。後來服 Kaopectate，才止住。不知何故。

寫完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書評。“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美國歷史評論》〕要我寫此書英譯本 (by Derk Bodde [德克·博德譯]) 的書評，我擔誤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

爲此事重看馮書兩遍，想說幾句好話，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好處。故此評頗指出此書的根本弱點，即是他(馮)自己很得意的「正統派」觀點(見自序二)。

「正統派」觀點是什麼？他自己並未明說，但此書分兩篇，上篇必須以孔子開始，力主孔子以前無私人著述，力主孔子「以能繼文王周公之業爲職志」，「上繼往聖，下開來學」。下篇必須叫做「經學時代」，也是此意。(但更不通！)

陳寅恪(審查報告二)說得比他清楚：「中國自秦以後，迄於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爲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學之產生及其傳衍而已！」此即所謂「正統派」觀點也。⁹²

由以上的引述，我們可看出胡適爲了要撰寫打擊馮友蘭的書評，竟然把自己的一天「水瀉了八九次」也置於度外，連在大年初一還在「扶病」「打拼」。

在「扶病打完」的英文書評中，胡適除了不能不承認馮書是「第一部也是唯

⁸⁹ 見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胡適致楊聯陞、勞榘函，同前註，頁239-240。

⁹⁰ 楊聯陞於十二月十四日覆胡適函云：「卜德譯馮芝生《中國哲學史》，上冊我沒有評過，下冊最近評了，HJAS 下期刊登，目下只有校樣。陳榮捷在 *Philosophy East & West* 合評過上下兩冊，您想必看見了。馮的《中國哲學小史》，前幾年評過，再附上一份。」同前註，頁241。楊氏寄胡適校樣上書有「適之先生教正：學生聯陞敬呈」等中文字。

⁹¹ 楊聯陞的書評刊於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3-4 (December 1954): 478-483。

⁹²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8冊，頁353。

一的一部」完整的中國哲學史這個唯一的優點之外，便繼續緣用舊時策略，緊緊咬住馮書「正統派觀點」這一「根本弱點」不放，藉以把馮書根本否定⁹³。儘管胡適在日記中，自以為自己的書評已打中了馮書的要害。但對於不明「正統派」這個「今典」的西洋讀者，胡適的書評便難免變得有點不知所云。因為，在當時的西方漢學界，「正統派的觀點」(“orthodoxy” Chinese standpoint)並不是一句刻毒的詛咒，有時甚至還是一句恭維的話⁹⁴。胡適的書評究其實並不能對馮書造成多大的毀損。並且，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自被Derk Bodde翻譯成英文之後，至今仍是西方漢學界必讀的經典，而胡適居然在「重看馮書兩遍」之後，竟然還「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好處」，這和胡適曾一再宣揚的「惡而知其美」的「持平」態度，似乎並不吻合。

(五) 院士提名

胡適唯一能予馮友蘭以沉重打擊的機會，是在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提名和選舉。在這次選舉中，胡適是主持大局的總操盤手。尤其是文科院士的當選，幾乎是胡適說了就算，可謂「一言九鼎」。如果胡適能利用手中的權勢，讓當時已被認為是當代中國哲學第一人的馮友蘭中箭落馬，便可以把馮友蘭正式逐出學術主流派，這對名位甚有企圖心的馮友蘭，無疑將是一極難堪的公開羞辱。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胡適在自己的日記中，錄下了一份他在該日「發出」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選舉『人文組』的『人文院士』部分擬提名單」：

- 哲學：吳敬恆、湯用彤、金岳霖。
- 中國文學：沈兼士、楊樹達、傅增湘。
- 史學：張元濟、陳垣、陳寅恪、傅斯年。
- 語言學：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
- 考古學及藝術系：董作賓、郭沫若、李濟、梁思成。
- 人文地理 } 想不出人名⁹⁵
- 民族學 }

值得注意的是，名列胡適的「擬提名單」之內者共有十七人，除了羅常培、

⁹³ 胡適的書評刊於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0.4 (July 1955): 890-900。

⁹⁴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英美世界的語意脈絡中，orthodoxy 有權威、正教、正統、正牌、正規等涵意，即使加了引號也不會變成一個貶義字。

⁹⁵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7冊，頁656-657。

沈兼士和傅增湘三人之外，其餘十四人均能順利出線當選⁹⁶。尤可怪者，吳敬恆（稚暉）本非學界中人，在學術上亦無重要成績，因與胡適友善故被胡適提名為哲學組院士之首，其排名尚在湯用彤、金岳霖之前。並且，馮友蘭當時已被認為是「當代中國哲學第一人」，其哲學成就尚在湯用彤、金岳霖之上，若胡適把其「哲學關門」論堅持到底，哲學組不設院士則已，若設院士馮友蘭必居第一。吳稚暉在中國哲學上的貢獻，又如何可與馮友蘭相提並論？而胡適所擬的哲學組院士名單中竟有吳稚暉而無馮友蘭，可見胡適取捨標準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已跡近是非不分。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是胡適政治上的死敵，而郭沫若的名字，竟也在胡適所擬的「考古學及藝術系」組中排名第二，可見胡適對馮友蘭的成見，甚至已超過了政治上的好惡。但是，當時的中國學術界畢竟和政界有所不同。政界可把黑說成白，把白說成黑；但在學界中只能把灰說成白，把灰說成黑，若要把黑說成白或把白說成黑則相當困難。儘管沒有胡適的提名，馮友蘭仍舊當選為第一屆中研院哲學組的院士，緊接著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評議會委員（常委）⁹⁷。由此可見，即令以胡適當時的權勢，仍無法完全違逆學界最起碼的公道和共識。這也說明了馮友蘭羽翼早成，已非胡適所能扼制。是以胡適對馮友蘭的打壓，不僅阻止不了馮氏繼續在學術主流中贏取更大的聲名，反而暴露出自己鮮為人知的另一面相。

（六）人身攻擊

胡適不斷從報刊和朋友的書信中得知，馮友蘭在中共統治下吃足了苦頭。臺北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藏有一封唐錫如於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一日致胡適函。當時唐錫如剛從大陸逃抵香港。其函云：

適之先生：

這兒附上的詩，是施蛰存兄給 先生的。他本來預備寫信託我帶來香港寄，因為危險性太大，所以改寫了詩，也沒有署名。這張紙是縫在棉襖裡的，所以幾次檢查都沒有查出。蛰存兄還囑我告訴 先生，請不要將他的

⁹⁶ 一九四八年三月中央研究院票選出第一屆院士共八十一人，其中人文組二十八人。他們分別是：吳敬恆、金岳霖、湯用彤、馮友蘭、余嘉錫、胡適、張元濟、楊樹達、柳詒徵、陳垣、陳寅恪、傅斯年、顧頡剛、李方桂、趙元任、李濟、梁思永、郭沫若、董作賓、梁思成、王世杰、王寵惠、周鯁生、錢端升、蕭公權、馬寅初、陳達、陶孟和。見中央研究院編：《中央研究院概況》（臺北：中央研究院，1982年），頁33。

⁹⁷ 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頁310。

詩公開發表，原因是他現在身在匪區，這對他怕有不利的緣故。……

中國的智識份子，除掉自甘墮落作賣國賊的以外，都在捱著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日子。朱光潛先生在北大，據說有半年多沒有一個學生上他的課，結果被逼寫了一封「自白書」，在華北人民日報上發表，全國各報即刻轉載了。馮友蘭先生聽說受的壓迫更加厲害，除掉一再逼他要撰文登報否定他自己哲學上的見解外，還要他參加京郊土改運動。我的家鄉有位老先生，近七十歲了，是一個中學校長，軍事代表逼牢他在街上「扭秧歌」表示前進，這位鬚眉皆白的老先生，當街表演這種醜態，當然惹起許多人發出哄笑，可是看了落淚的也大有人在。……

至於施蛰存那六首被「縫在棉襖裡」夾帶出來的呈胡適詩則云：

萬戶無煙困鹿虛，那堪一夕幾抄梳。江南生意隨年盡，緝網猶為竭澤漁。
排門豪吏日追呼，徵卻秋糧又借租。四野蕭條少薇蕨，滿城鼓吹頌唐虞。
決奪枋榆燕雀喧，欲迴天地入柶藩，可憐日暮碧雲合，何處凌霄健翩翩。
人生識字憂患始，鎔經鑄史爾何爲。天子聖明臣自昧，蒙恩許作責躬詩。

記芝生孟實

長安寇盜多狐魅，汴洛王師亦虎狼。秦婦吟成何處獻，韋郎行止費商量。
渡河浮海想艱辛，殉道何須更殉人。虎變久孚天下占，好將禪讓輔堯仁。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遙寄將意，此亦天下之公言也。⁹⁸

無論是唐函還是施蛰存呈胡適詩中第四首，都特別提到了馮友蘭和朱光潛等大知識子的屈辱與辛酸。這些讀之令人鼻酸的慘況，也印證了胡適一再向外宣稱的在中共統治下決無思想和言論自由的「先見之明」。由於胡適對大陸知識分子的遭遇有存在的真實感悟，他對大陸知識分子有著一份真切的同情和悲憫，甚至在大陸的同事、朋友和學生寫文章批判自己之時，也大都秉持著「犯而勿校」的寬恕態度。胡適於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二日在日記中曾引王荊公〈擬寒山拾得〉詩以明志：

風吹瓦墮屋，正打破我頭。瓦亦自破碎，豈但我血流。

我終不噴渠，此瓦不自由。……⁹⁹

胡適對大陸知識分子的同情、悲憫、寬恕和「犯而勿校」的高尚情操，一遇到馮友蘭便不免變了質。馮友蘭的苦難，並不能引來胡適的同情心。他明知馮友

⁹⁸ 引自〈唐錫如致胡適函〉，臺北胡適紀念館收藏，館藏號HS-US01-060-020。

⁹⁹ 引自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8冊，頁22。

蘭身陷「竹幕」，已沒有任何答辯的可能和機會的情勢下，還是照樣寫出全盤否定馮書的英文書評。他也照樣引用不實的流言，對馮友蘭作人身攻擊。據胡頌平編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星期日）條云：

晚飯後，錢思亮夫婦來，大家就在客廳裏隨便談天。先生說翁文灝的父親是個大少爺，他本人也是個大少爺出身。後來在比利時進一個修士辦的學校，又受了這些修士的訓練，養成了一種非常刻薄的性格，人家很難做他的下屬的。據說翁文灝已經死了，李仲揆（四光）也病了。後來談到陳寅恪，又談到姜立夫。「在天主教辦的一個刊物上，知道馮友蘭在那邊認過一百三十次的錯，自己承認是無可救藥的資產階級。他本來是個會打算的人，在北平買了不少的房地產。一九五〇年在檀香山買了三個很大的冰箱帶回去，冰箱裏都裝滿東西，帶到大陸去做買賣，預備大賺一筆的。他平日留起長鬍子，也是不肯花剃鬍子的錢。此外，現在三反五反之後的錢端升、朱光潛、沈從文、華羅庚等人，聽說過得非常的苦」。¹⁰⁰

胡適有時會在「隨便談天」時中傷對手，周作人對此曾言之鑿鑿。胡適明知大陸知識分子的自白和檢查，泰半是屈於威權和壓力之下自行「上綱上線」的自誣和自污之詞，不僅與事實相差極遠，有許多甚至是根本不能算數的。但胡適這次談話涉及馮友蘭的地方，卻似乎是要證明，馮友蘭確實是一個「無可救藥的資產階級」，而中共批鬥馮友蘭「一百三十次」其實並沒有弄錯。並且，胡適依據的材料，又大都是些誣枉之詞。首先，關於馮友蘭從美國帶回電冰箱一事，胡適便弄錯了三個地方。(1)馮友蘭由美返抵國門的時間，其實是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初，而非胡適所說的「一九五〇年」；(2)馮氏只帶回了一個冰箱，而非三個冰箱，(3)該冰箱已經捐贈清華校醫院，而非為了「帶到大陸去做買賣，預備大賺一筆」。據馮友蘭女兒馮鍾璞說：

回想起來，父親和母親一生自奉甚儉，對公益之事總是很熱心的。一九四八年父親從美國回來，帶回一個電冰箱，當時是清華園中唯一的，大概北京城也不多。知道校醫院需要，立刻捐出。¹⁰¹

其次，馮友蘭的長鬍子，是在抗戰期間由長沙臨時大學開赴昆明西南聯大途中才開始留起來的，一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後始剃掉。蓄長鬍的原因，其

¹⁰⁰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頁169。

¹⁰¹ 引自宗璞：〈三松堂歲暮二三事〉，《宗璞文集》（第一卷）（北京：華藝出版社，1996年），頁64。馮家至今仍保有清華大學校醫院為捐贈冰箱所開的收條。

始是因爲途中折臂而不能剃鬚，其後是因爲愛美而不忍剃鬚，並非如胡適所謂「不肯花剃鬚子的錢」。此事已在聞一多於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致其妻函中得到證實。聞一多函云：

還有一件東西，不久你就會見到，那就是我旅行時的相片。你將來不要笑，因爲我已經長了一副極漂亮的鬚鬚。這次臨大搬到昆明，搬出好幾個鬚子，但大家都說只我與馮芝生的最美。¹⁰²

最後，有必要稍稍探究一下，馮友蘭是否真如胡適口中所說，是個唯利是圖、性好聚斂和吝嗇的人？據全漢昇夫人告訴筆者，馮夫人持家的確十分節儉，家事常親力親爲，資薪節餘亦曾在北京購置一房產¹⁰³。此與馮鍾璞所謂「父親和母親一生自奉甚儉」相吻合，也與馮氏在反省交代時有房產一項相吻合¹⁰⁴。但以資薪節餘購置房產本是薪水階級的生活常態，同時也並非壞事。並且，馮友蘭在北平一共只買了白米斜街三號這麼所房子¹⁰⁵，絕非如胡適所謂「在北平買了不少的房地產」。馮氏雖自奉甚薄，但對周人之急及公益事業卻十分大方。據馮鍾璞說，她曾根據其父的遺願，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日把馮友蘭的遺產人民幣五萬圓捐贈北京大學，設立「馮友蘭學術基金」，藉以「在北大中文、歷史（中國歷史）、哲學（中國哲學）三系設立獎學金，並每三年一次面向全國獎勵有創見的哲學著作」¹⁰⁶。馮鍾璞還根據其父的遺願，向家鄉河唐縣圖書館和祈儀鎮中學各捐贈了人民幣一萬圓¹⁰⁷。其後又將馮氏版稅人民幣五萬圓贈清華大學，設馮友蘭獎學金。十二萬圓人民幣在當時的中國大陸也算得上是一筆鉅款！此外，馮友蘭生

¹⁰² 引自聞黎明、侯菊坤編：《聞一多年譜長編》（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542-543。

¹⁰³ 先師全漢昇先生知道筆者近年來研究馮友蘭，特別指示筆者訪問全夫人。蓋全師母在史語所遷昆明時，在生活上常受馮友蘭夫人的照拂，其長子任洪誕生時亦由馮夫人幫助接生。據全師母說，馮夫人曾一再叮囑她持家必須勤儉，在條件許可之下，每月必須把薪金一部分節省下來，以備不時之需。馮夫人在北平時，曾每月把馮先生的一半薪金節省下來購置了物業。訪問全師母的時間約在一九九七年八月間，一共四次，地點是在臺北中央研究院活動中心。

¹⁰⁴ 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頁505。

¹⁰⁵ 筆者在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日下午在北京大學燕南園五十七號走訪馮鍾璞及其夫婿蔡仲德，據馮鍾璞告知，馮友蘭僅在抗戰前在北平購置了一房子，位於白米斜街三號，原爲張之洞在京別業云云。該房子在五十年代爲補貼家用已轉售他人。

¹⁰⁶ 見宗璞：〈三松堂歲暮二三事〉，頁64。

¹⁰⁷ 同前註，頁64。

前曾幫助孫炳文之遺孤求學¹⁰⁸，也曾撥前院義助聞一多遺屬。據馮鍾璞說：「聞先生罹難後，清華不再提供住宅。父親邀聞伯母帶孩子們到白米斜街家中居住。我們住在後院，立雕一家住前院。……後來我們遷到清華住了，他們一家經組織安排到解放區。」¹⁰⁹聞一多雖與馮友蘭在清華同事多年，但由於聞一多在抗戰後期思想急劇左傾，曾撰詩文謾罵和嘲諷聯大師友同事，連馮友蘭也成了他的攻擊對象¹¹⁰。在昆明「一二一」事件之後，因為馮友蘭堅持為拯救聯大免於被國府解散故學生罷課必須早日結束，而聞一多則支持學生繼續罷課，兩人爆發了激烈爭論，馮友蘭甚至申斥聞一多及其民盟同志為「中共尾巴」。但聞一多遇刺身亡之後，被聞一多生前嘲罵譏刺的馮友蘭卻敢於挺身而出適時伸出援手。對於馮友蘭的不念舊惡和見義勇為，聞家不免十分感激。在馮友蘭逝世之日，聞一多之子聞立雕曾給馮鍾璞信云：「我永遠忘不了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伯父、伯母給我們的關懷、幫助和安慰。我們兩家兩代人的友誼，是我腦海裏永不會消失的美好記憶與回憶。」¹¹¹所有這些，都可證明馮友蘭並非如胡適所形容的那麼不堪。

(七) 附骨之疽

胡適非常喜歡把「但開風氣不為師」這一詩句掛在嘴邊。但他可能並沒有真正覺察到，這一詩句竟變成了「詩讖」，變成了他一生學行，尤其是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的真實寫照。

如果只能用兩個字去概括胡適的學術心靈，這兩個字就是「清淺」。胡適對西方現代學術無疑有著相當豐富的常識，而他那既「清」且「淺」的學術心靈，又有助於他把西方現代學術輸入中國之時，把這些常識說得清楚、講得淺顯，使當時尚不知現代學術為何物的中國讀者聽得懂也跟得上。當時中國正處在「學問飢荒」的時節，胡適從西方轉手的常識，便成了中國知識階級療飢止渴的救命乾糧。中國知識階級正是通過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的常識性的啓蒙和洗禮，才完成了由傳統到現代的學術轉型。

但是，常識只有在極端缺乏常識的社會中才變得重要和寶貴，一俟社會不再

¹⁰⁸ 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頁98。

¹⁰⁹ 引自宗璞：〈星期三的晚餐〉，《宗璞文集》（第一卷），頁57-58。

¹¹⁰ 聞一多曾撰〈八教授頌〉，據他自云「計畫是要和教授階級算帳」。被他清算的八教授中，除了用來「作陪」的張奚若和他自己之外，尚有潘光旦、馮友蘭、錢穆、梁宗岱、沈從文、卞之琳六人。見聞黎明、侯菊坤編：《聞一多年譜長編》，頁723-729。

¹¹¹ 引自宗璞：〈星期三的晚餐〉，頁58。

缺乏常識，常識便會變成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尋常器物，再也乏人關注，鮮人珍惜；一如三餐飯飽的人，所欲求的極可能是山珍海味，而極不可能是乾糧。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之所以被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取代，其原因當然有許多方面；但胡書中所能提供的僅僅是常識，而這些常識在中國學術轉型完成後，便已一變為平庸無奇的老生常談，應該也是一個極重要的原因。

大概是太過陶醉於自己在「開風氣」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輝煌勝利吧！聰明絕頂的胡適卻忘記了「見好即收」的道理，他在「開風氣」之後還念念不忘要繼續「為師」。他忘記了「開風氣」可以靠常識，而要想在治中國哲學史方面「為師」的話，除了要有常識之外，還必須要有高於常識的「義理」。他可能還不知道，他的泛科學主義的「實證」或「考據」心靈，又讓他特別拙於談玄說理，因而從事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和撰寫工作，對他自己的性向本是非常的——如果不是天生的——不合適。他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成書之後，卻居然以為天底下只有他才夠資格寫中國哲學史。

在胡適眼中，西洋人的中國國學程度太差，根本不配寫中國哲學史。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九日《胡適日記》云：

上午去看 M. Pelliot [伯希和] 談了兩點鐘。……我告訴他，他編的目錄很多錯的。我只讀了五十卷子，只占全部三十分之一，已發現了不少錯誤。他要我把這些錯誤記出來，他願意更正。¹¹²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胡適日記》云：

Prof. Soothill [肖塞爾教授] 帶我去看 Bodleian Library [鮑德列恩圖書館]。這是一個很有名 Library，但他的 Catalogues [目錄] 實在不高明，比起美國的 Library Catalogues [圖書館目錄] 來，這裏真是上古時代了。此間的中國書部更是大笑話！Soothill 自己動手編了一個書目，不知費了多少年月，僅成一小小部分。我偶一翻看，其中錯誤大可駭人聽聞！《花間集》目云：「這是一冊日本詩歌，廣政十年在 Kyoto [西京] 印的。」（原文是英文）我問他，怎麼知道是在 Kyoto（西京）印的？他也莫名其妙。翻開一看，書上明寫著「大蜀歐陽炯敘」！……「金人瑞聖嘆」變成了「金朝人，姓瑞，名聖嘆」！……與此片同類的是《楚辭》片上寫著注者名王逸上！¹¹³

¹¹² 引自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4冊，頁342-343。

¹¹³ 同前註，頁433-434。

伯希和是西方漢學泰斗，Soothill 也非等閒之輩。眼看著他們竟可以鬧出把金聖嘆變為「金朝人，姓瑞，名聖嘆」諸如此類「大可駭人聽聞」的「大笑話」，難怪胡適要從心底裏發出「此事非我們來幹不可」的慨嘆¹¹⁴。

不僅中文程度甚差的西洋人不夠資格撰寫中國哲學史，在胡適眼中，就連中文程度不錯的日本人，也不配撰寫中國哲學史。原因是他們實在太笨，對中國佛教尤其是禪宗思想根本不能領悟。胡適在日記中無論是對鈴木貞太郎還是對忽滑谷快天等禪學名宿的作品都有許多相當負面的評價，認為不是「越講越糊塗」¹¹⁵，就是「辜負了這些好材料」¹¹⁶。胡適曾慨乎言：「日本人信淨土，奉真言宗，皆夠資格。他們的禪，實在不曾『窺其藩籬』。他們以『禪定』為禪，是印度禪而非中國禪，他們以『茶禮』為禪，是日本禪而非中國禪。」¹¹⁷

不僅西洋人不行，東洋人不行，就連名滿天下，曾為中國哲學史問題和胡適唱過對臺戲的梁啟超也不行。胡適在日記中曾試圖替梁啟超一生作蓋棺定論：「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統系的訓練，好學而不得良師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響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幾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傳世不朽者何在，頗難指名一篇一書。後來我的結論是他的《新民說》可算他一生的最大貢獻。《新民說》篇篇指摘中國文化的缺點，頌揚西洋的美德可給我國人取法的，這是他最不朽的功績。」¹¹⁸ 甚至被他一再公開宣稱學問遠勝自己的傅斯年也不行。胡適雖曾公開恭維過傅氏的《性命古訓辨證》以及該書對他的重大影響，但這些不必都是胡適的真心話。胡適對傅斯年的不滿，最早見於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胡適日記》：「這幾天與孟真談，雖感覺愉快，然未免同時感覺失望。孟真頗頹放，遠不如頡剛之勤。」¹¹⁹ 胡適對《性命古訓辨證》一書的真實評

¹¹⁴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讀 Masson-Oursel's "Comparative Philosophy" [馬森·奧塞的《比較哲學》]。此書主旨甚可玩味，但是關於東方（尤其是吾國）材料不夠，故結論很多誤解。其 comparative chronology [比較年表] 中遺漏甚大。其最大者為①不舉禪宗之四個世紀；②不舉清代之思想。此事非我們來幹不可。」引自同前註，頁233。

¹¹⁵ 見一九五二年五月十四、十五日胡適在日記中對鈴木的批評，同前註，第8冊，頁229-231。

¹¹⁶ 見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胡適在日記中對忽滑谷的批評，同前註，第4冊，頁361-362。

¹¹⁷ 見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胡適的日記，同前註，頁389-390。

¹¹⁸ 引自一九二九年二月二日胡適的日記，同前註，第5冊，頁354。

¹¹⁹ 同前註，第4冊，頁280。

價，其實應見於他在一九五三年九月五日的致楊聯陞函：

《性命古訓辨證》一書，我今夜讀一遍，頗不滿意，其下篇尤「潦草」，則自序中已言之。實則上中兩篇也只夠一短文。當時在戰禍中，他又太忙，故此書頗不能使人滿意。你以為如何？¹²⁰

傅斯年尚且如此，被胡適謾罵為「天下第一蠢人」的馮友蘭當然就更加不行。然而，「第一蠢人」馮友蘭居然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出版了他的《中國哲學史》上冊之後，不旋踵即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出版了《中國哲學小史》，一九三四年九月又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全書。並且，馮友蘭的大哲學史和小哲學史在出了中文版之後又出了外文版；而馮友蘭居然在撰寫完中國哲學史之後，又賈其餘勇奮筆寫出六大本建立自己「新理學」哲學體系的「貞元之際書」¹²¹。尤有甚者，無論是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或是中國哲學的著述，都是從正面肯定中國歷史文化的永恆價值和現代意義，因而又都是和自己一以貫之的「全盤性反傳統」的文化和學術主張唱對臺戲；眼看著自己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已被馮書所取代，而中外治中國哲學史和中國哲學的專家學者們，口中也只有馮友蘭而極少再提及自己。被後進超越的失落和被學生「背叛」的怨恨，致令胡適一腔子的不甘心不情願再加上不服氣，鬱結成了一團憤憤不平之氣。在胡適看來，「第一蠢人」馮友蘭之所以膽敢如此的張狂，如此的得意，歸根結柢，還不是因為我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下冊至今尚未寫出來嗎！一念及此，胡適一再的自惕自勵，不斷的許願發誓，一定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把自己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下冊完成。但是，一想到自己曾十分起勁地唱過「哲學關門」和「哲學無用」的高論，自己又怎好意思再去弄這一套「無用」並將要「關門」的學問？幸而胡適想到了以「中國思想史」取代「中國哲學史」的點子，有了此一轉換，一來便不致落人口實，二來也遂了自己「獨尊史學」的宿願。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胡適日記》云：

年底忽收到Princeton〔普林斯頓〕大學的“Special Program in the Humanities” Committee〔「文史專門計劃」委員會〕主席Prof. Whitney J. Oates〔惠特尼·丁·奧茨教授〕來信說，有人提我的名，為Alfred Hodder Fellowship〔阿爾佛萊德·霍德基金會〕之候選人。……

我想了幾天，今天才回信與Oates〔奧茨〕，說他們可以考慮我的姓名。我

¹²⁰ 引自胡適紀念館編：《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頁194。

¹²¹ 「貞元之際書」又簡稱為「貞元六書」，其中包括《新理學》（1939）、《新事論》（1940）、《新世訓》（1940）、《新原人》（1943）、《新原道》（1945）和《新知言》（1946）這六本書。

頗想借一棲身之地，把《中國思想史》的英文簡本寫定付印。

前些時曾見馮友蘭的“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國哲學簡史》〕，實在太糟了。我應該趕快把《中國思想史》寫完。¹²²

聽胡適的語氣，原來他之所以接受了普林斯頓大學的Alfred Hodder獎助的提名，主要還是爲了找一個有薪水可發的地方把自己的《中國思想史》寫出來，免得讓馮友蘭「實在太糟」的《中國哲學簡史》繼續謬種流傳，遺毒天下。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八日胡適在該日的日記簿上，剪貼了一則剪報，係剪自一九五二年十月三十日臺北《中央日報》記者對胡適的專訪。該訪問稿報導了胡適即將於十一月九日離美，十二日抵臺講學的新聞；同時也報導了胡適爲了著書的緣故要把在普大圖書館的工作辭去的決心。據該記者云：「不過胡博士想寫的書卻是首先打算完成他的《中國哲學史》，而且要改名爲《中國思想史》。他還想完成《中國白話文學史》。此外，《水經注》的稿子他花了好幾年功夫，也想完成。」¹²³我們知道，胡適重要的著作往往只寫完並出版了上半部之後，下半部便再沒有下文，《中國哲學史大綱》是如此，《中國白話文學史》是如此，《四十自述》也是如此。故學界恆稱之爲「胡一半」，而尖酸刻薄者則嘲之爲「太監」——蓋因其總是有上頭而無下頭也。從《中央日報》記者的報導，我們又知道了在所有只有「半部」的著作中，胡適最渴望寫完的還是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亦即他後來稱之爲《中國思想史》的那部書。這種渴想之強烈，以致使胡適爲了著書連噉飯之地也想過要放棄了。

儘管胡適亟欲把他的《中國思想史》寫完，以取代甚至取消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但無論他如何賭咒，如何著急，《中國思想史》就是寫不出來。胡適把寫不出書的原因歸咎於自己的好熱鬧和喜交朋友。周作人曾說過，若要胡適把中國哲學史寫完，除非派一連兵把胡適囚禁在山上一二年，不許他下山，不許他會客，不許他談政治¹²⁴。胡適對此深以爲然。在實在寫不出書的時候，胡適也常常突發奇想，希望有一天能被關入大牢裏著書。一九三二年底胡適對《東方雜誌》記者談他的新年夢想，曾表示他的夢想是被關在一個理想的牢獄裏十至十五年，不許見客，只能讀書和著書，好把全部著作都寫出來¹²⁵。一直到了一九五二年五

¹²² 引自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8冊，頁6-7。

¹²³ 同前註，頁261。

¹²⁴ 參見白吉庵：《胡適傳》，頁299。

¹²⁵ 參見同前註。

月二十七日，胡適還在該日日記簿中貼了一張剪報，內有一讀者致《紐約先驅論壇報》的一封信。信中引哈佛大學P. A. Sorokin 書中語，認為沙俄對「政治犯的流放和監禁，實質上是給了他們一次開銷很大的休假」。胡適在該日日記中寫道：

此信很有趣。我屢次說，倘使國民黨肯把我送到監獄裏去同陳獨秀享受一樣的待遇（除了他的「土摩登」朋友的探視一項），只消三年，我的幾部書都可以寫完了。

Sorokin〔索羅金〕的書，我沒有看見，但他說 vacation with most of the expenses paid〔開銷很大的休假〕，大有我當日羨慕獨秀的監獄生活的精神。¹²⁶

但胡適畢竟不是陳獨秀，國民黨既沒有任何理由，也沒有膽量把他關在大牢裏，那怕短短的一天，更不消說是關上整整的三年——如果胡適選擇了留在大陸接受中共的統治，說不定還真能有把牢底坐穿的希望。正因如此，儘管胡適極其羨慕陳獨秀在監獄裏的「享受」，到頭來還是與坐牢著書無緣。但倘若我們把胡適的《中國哲學史》或《中國思想史》不能完篇的責任，怪罪到國民黨的頭上，那也大可不必。即使國民黨真的把胡適關在監獄裏，讓他享受到和陳獨秀完全一樣的待遇，胡適的《中國哲學史》或《中國思想史》還是照樣寫不出來。因為，胡適既然把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的著述說得不值一文，他就必須拿出勝過馮友蘭的作品。但若要超越馮友蘭，胡適便不能再依靠組織介引西方的學術常識——因為中國早已渡過了「學問饑荒」的克難期，也不能僅僅依靠對歷史人物的生平和對歷史文籍真偽的考證——因為這些都是哲學史研究和書寫的外緣性和次要性的問題，而必須談玄說理，必須深入中國各哲學家和哲學流派的義理系統，並對這些系統作出恰如其分的和相應的評判與安排。然而，胡適除了常識之外，所憑藉的主要是考據。胡適常自誇自己有「歷史癖」和「考據癖」，但他一生最感興趣、最引以為傲和最努力從事的工作，只是關於歷史人物的生平和歷史文物真偽的考證，故他的「歷史癖」其實只不過是「考據癖」。余英時曾指出：「胡適在學術上的興趣本在考證」，「胡適學術的起點和終點都是中國的考證學」，此真乃確鑿不移的結論¹²⁷。天生的「考據癖」加「狹義的」歷史家的訓練，使他即使在研究中國哲學史或中國思想史的時候，也常常不知不覺地把哲學史或思想史最核心的義理和價值問題，轉換成了外緣性的考據問題，然後再用外緣的考據企圖解決——但其

¹²⁶ 引自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8冊，頁234-235

¹²⁷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頁72。

實是掩蓋——核心的義理和價值問題。並且，從其極狹隘的泛科學主義信仰出發，胡適對一切形上學不僅毫無會心，毫無興趣，而且避之還唯恐不及；而胡適全盤性反傳統的文化立場及其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進步史觀，又使胡適靈魂深處懷有著一種現代人對古人的傲慢¹²⁸。由於胡適對義理和價值問題的排斥，以及對古代哲人欠缺「瞭解之同情」¹²⁹，所有這些，都使得他的個人性向非常的——如果不是天生的——不合適談玄說理，因而也非常的——如果不是天生的——不合適地從事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和撰寫工作。只有看穿了這一層，我們才有可能明白，為什麼信誓旦旦要爭分奪秒把《中國哲學史》或《中國思想史》完成的胡適，卻偏偏要花十年以上的時間，去考證與中國哲學史幾乎扯不上任何關係的《水經注》公案；為什麼無限嚮往坐牢著書生活的胡適，卻幾乎天天都在賓客盈門的交際應酬中銷磨掉大半最寶貴的光陰。胡適這些反其道而行的做法，其實是一種心理上的逃避——一種無法寫出超越馮友蘭的著作，卻又不願去承認，不敢去面對的逃避。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無疑是胡適後半生的附骨之疽和揮之不去的夢魘，而考證《水經注》公案和應酬交際便因之變成了胡適心靈上最佳的避難所。

結語

自清季以來，在西潮的沖刷之下，中國社會開始了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胡適和馮友蘭都是這一社會轉型過渡時期的代表人物。轉型社會的重要特徵之一，是新舊道德的並行和中西價值觀的混雜。中西的道德和價值觀的歧異和衝突，亦突出地表現在中國學者在中國和西方「師生之道」的不同選取之中。若依照西方的「師生之道」，在西方學術界，學生在學成之後，總得別出心裁另起爐灶，力求在學問上質疑、挑戰、甚至推翻自己老師的學說。規行矩步墨守師教於師言無所不悅者，即使在老師的眼中，也是既愚且笨兼沒出息的學生。馮友蘭之超越胡適，以及馮書之推翻並取代胡書，此之謂順天應人，亦所謂後來居上與推陳出新，在西方學界便如同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一般的理所當然。但倘若依照中國的「師生之道」，學生又必須恪守師教，對老師心悅誠服，亦步亦趨，一如於孔子之言無不悅的顏回。馮友蘭在窺盡胡適之堂奧底蘊之後，居然入室操戈，拔趙幟、

¹²⁸ 詳見翟志成：〈中國當代學術典範的建立：救亡思潮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頁156-164。

¹²⁹ 陳寅恪：〈審查報告一〉，收入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附錄一，頁1。

易漢職，以「釋古」的典範取消了胡適「疑古」的典範，讓乃師抱憾終身。面對中西不同的「師生之道」，以「闡舊邦以釋新命」自任的馮友蘭所選取的無疑是西方的價值標準，故對自己推翻和取代老師的學說心安理得，沒有一絲一毫的羞慚負疚之情；而作為一個鼓吹「全盤西化」的「全盤性反傳統主義者」，胡適所選取的卻反而是中國的傳統標準。是故被西方學者視之為天經地義之事，落到胡適頭上便完全改變了性質。被學生推翻和超越之後挑激起來的痛楚失落懊惱和妒忌，以及隨之而來的不情願不甘心再加上不服氣，在胡適心中鬱結成一團終生難解的憤憤不平之氣。日後胡適只要找到機會，總不會忘記對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及馮友蘭本人實行抹煞和打壓。胡適長時期對馮友蘭那種近乎非理性的尖酸刻薄，和他一貫以溫良恭儉讓待人接物的開明紳士形象，構成了如許巨大的反差，這說明了胡適在「師友之道」的立場上，畢竟還是一個十分傳統的中國人。「全盤西化」豈易為哉，「全盤性反傳統」更是談何容易！

被弟子超越之後 ——胡適的馮友蘭情結

翟志成

胡適的一生之中，有過眾多的學生和朋友，但也有一些政治上和學術文化上的敵人。但無論是對政敵和學敵，胡適大都放不下「正人君子」的身分和「縉紳階級」(gentleman)的架子，而總會顯示出其寬厚、持平、講理、公道、彬彬有禮和不為己甚的良好態度和修養。如果說，胡適對魯迅、梁漱溟、郭沫若等政敵學敵，確實秉持了「惡而知其美」的持平態度，但當他一面對自己的老學生馮友蘭，便好像變成了另一個人，不僅「惡而知其美」的持平態度不翼而飛，就連他平日頗為自矜的「正人君子」的身分，還有那「縉紳階級」的架子，也可以因馮友蘭而一齊拋入汪洋大海。對馮友蘭的憎惡，已在胡適心中糾結成一團漆黑如墨的情結，幾乎是終生不可開解。胡適長時期對馮友蘭的種種苛責，與他一貫待人接物的溫良恭儉讓，構成了如許巨大的反差，這不僅使胡適的研究者咸感困惑，恐怕就連胡適自己一時間亦難以說清楚講明白。本文通過系統性地比對和剖析了胡適大量的日記、書信、文稿以及其它相關資料，把握了胡適心靈上鮮為人知的另一面相，並勾勒了胡適的「馮友蘭情結」的萌芽、形成和發展的曲折過程。本文認為，胡適的馮友蘭情結，乃係緣於自己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被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超越和取代之後，又無力扳回一城而挑激起來的不情願不甘心再加上不服氣，以及隨之而來的痛楚失落懊惱和妒忌。

關鍵詞：胡適 馮友蘭 《中國哲學史》

Outperformed by His Student: Hu Shi's Feng Youlan Complex

CHAK Chi-shing

An American-educated liberal and a gentleman in the Western style, Hu Shi characteristically treated his political or intellectual opponents in a fair and graceful manner. But he turned overly harsh and even venomous when dealing with his one-time student Feng Youlan, as well as Feng's works. Scholars have always been intrigued by Hu's Feng Youlan complex. And it appears that even Hu Shi himself was sometimes bewildered about his own attitude toward Feng.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relevant documents such as diaries, correspondence and manuscripts; attempts to delineat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complex; and sheds light on this dark aspect of Hu's character. It suggests that Hu's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was surpassed and replaced by Feng's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his became a source of annoyance and frustration to Hu.

Keywords: Hu Shi Feng Youlan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